

# 南朝买地券综论

易西兵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055)

**内容提要:**江南和华南地区已经发现 22 件南朝买地券。它们依券文可分为三类,在内容、书写格式和行文语气上均有区别。总体上,南朝买地券一方面包含了强烈的道教因素,表明道教在南朝底层社会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券文内容也反映了南朝社会的生死观念和埋葬习俗。

**关键词:**南朝 买地券 道教 埋葬习俗

**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 引言

买地券作为一种有文字内容的随葬明器,对于墓葬断代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葬俗、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买地券最早出现于东汉<sup>[1]</sup>,此后各历史时期都有发现。近年来,随着各地考古出土的各时期买地券不断增多,学界对买地券的研究也日趋广泛和深入<sup>[2]</sup>。

六朝是买地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江南和华南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铅、砖、陶、滑石等质地的买地券,其中南朝买地券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笔者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中搜集到 22 件南朝买地券,以下拟对它们进行综合分类研究,并对其包含的道教因素及其反映的南朝社会问题进行粗浅探讨,求教于各位方家和同行。

### 一 材料及分类

22 件南朝买地券分布地域较广:江苏出土 1 件<sup>[3]</sup>;湖北、湖南、广东各 4 件;广西出土 9 件,数量最多,其中仅桂林地区就出土 7 件。

从时代上看,刘宋时期最多,共 10 件,其中 9 件为元嘉年间(423~453 年),1 件为泰始六年(470 年),萧齐时期 5 件,均为永明年间,萧梁时期 7 件。目前所见最早者为元嘉九年(432 年)王佛女买地券,出于江苏徐州<sup>[4]</sup>,最晚为梁大通五年(533 年)周当界买地券,出于广西桂林<sup>[5]</sup>。陈时期尚未见买地券出土。

买地券的质地方面,石质 4 件,滑石质地 9

件,砖质 8 件,陶质 1 件。

书写格式上,王佛女、周当界买地券不详,其余 20 件买地券有 17 件为竖行刻写,只有湖南资兴出土的 3 件用朱砂书写。字体以楷体或行书为主。部分买地券先在四周和直行刻划格线,再写券文。广州出土的龚韬买地券<sup>[6]</sup>更加讲究,先在滑石表面刻划出小方格后再刻写券文,券文显得工整美观。周大通买地券在四周和直行都划有双行界线。

22 方买地券尺寸不一,券文字数本身存在长短不同,加上保存状况的差异,券文多有泐损,字数保存最少者仅十余字,多者近五百字。由于券文泐损,一些重要历史信息已经消失。所幸经过学界的努力,多数买地券的券文得到比较准确的释读,部分残损的券文也通过比较得到补齐。

分类研究是买地券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志高、董庐曾对六朝买地券作过比较全面的分类研究<sup>[7]</sup>。券文内容是买地券的重要分类研究标准。本文依此标准,将 22 件南朝买地券分为三类。

甲类,地券内容比较简单,仅写明墓主姓名、下葬时间、生前居住地、买地及四至、证人等内容。包括宋泰始六年欧阳景熙地券<sup>[8]</sup>、齐永明四年佚名地券<sup>[9]</sup>、齐永明年间佚名地券<sup>[10]</sup>、齐永明五年秦僧猛地券<sup>[11]</sup>、齐永明五年黄道丘地券<sup>[12]</sup>、梁天监十八年覃华地券<sup>[13]</sup>共 6 件。

以宋泰始六年欧阳景熙地券为代表。据介绍,此买地券于 1938 年修筑湘桂铁路时在桂林市观

收稿日期 2008-04-03

作者简介 易西兵(1977~),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广州地区城市考古、港澳史前考古。

音阁附近挖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陶器。买地券为滑石质地,长方形,长18.2、宽11.6、厚0.5厘米,表面经打磨极为光滑,正面刻券文7行,竖写,满行13~18字不等,楷书。券文如下:

宋泰始六年十一月九日,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没故道民欧阳景熙,今归蒿里。亡人以钱万万九千九百文,买此冢地。东至青龙,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四域之内,悉属死人。即日毕了。时王侨、赤松子、李定、张故分券为明,如律令。

乙类,包括宋元嘉十六年简谦买地券中的两块(分别编号M8右:9-2;M8右:9-3)<sup>[14]</sup>、宋元嘉十九年姝女买地券之一<sup>[15]</sup>、宋元嘉二十七年龚韬买地券、梁天监五年熊薇买地券<sup>[16]</sup>、梁普通四年熊悦买地券<sup>[17]</sup>共5件。此类地券中所提及的地下官吏和道教神仙几乎完全相同。

乙类以龚韬地券保存最为完整。龚韬买地券出于墓道上部近封门处,置于砖函内。滑石质,近方形,长18.5、宽17.9、厚0.9厘米。表面打磨光滑。在表面划出小方格后阴刻文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刻写较随意。共214字,全文如下:

元嘉廿七年三月廿四日,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地下死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侯、丘丞墓伯、地下二千、安都丞、武夷王等,共卖此地,纵广五亩,与南海郡番禺县都乡宜贵里州从事史、男死人龚韬,得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得;随生人所居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藏埋韬尸。丧魂魄自得还此冢庐,随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吉日、月晦十五日,休依女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存问。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韬地。时人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茹。

券尾无符咒。该墓前、后室还随葬有滑石符牌,残存5件,上面阴刻字符,未能辨识。

丙类,包括宋元嘉十年徐副买地券<sup>[18]</sup>、宋元嘉十六年简谦买地券之一(编号M8:9-1)、元嘉十九年姝女买地券之二、元嘉二十一年佚名买地券<sup>[19]</sup>、齐永明三年刘凯买地券<sup>[20]</sup>、梁天监四年佚名买地券<sup>[21]</sup>、梁普通元年何靖买地券(2件)<sup>[22]</sup>、梁中大通五年(533年)周当界买地券共9件。以湖南长沙出土宋元嘉十年徐副买地券保存较好。此券于1977年夏发现于湖南长沙麻林桥一座砖室墓中,墓室已毁,结构不明。随葬器物残存三足砚等青瓷

器。买地券质地为青石板,长33、宽26、厚2厘米。券文镌刻而成,直书,稍带隶意,共17行,满行25~36字不等,全文493字,保存完整,无一泐损。文末刻有一符篆。全文如下:

宋元嘉十年太岁癸酉十一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辰时。新出太上老君符敕。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后土,土皇土祖,土营土府,土文土武,土墓上、墓下、墓左、墓右、墓中央五墓主者,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左右冢侯,丘墓掾史,营土将军,土中督邮,安都丞,武夷王,道上游罗将军、道左将军、道右将军三道将军,蒿里父老,都集伯长,营域亭部,墓门亭长,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等;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界官祭酒、代元治黄书契令徐副,年五十九岁,以去壬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醉酒寿终,神归三天,身归三泉,长安蒿里。副先人立者旧墓乃在三河之中,地宅狭窄,新创立此。本郡县乡里立作丘冢,在此山罡中。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不敢选时择日,不避地下禁忌,道行正真,不问龟筮,今已于此山罡为副立作宅兆。丘墓营域,东极甲乙,南至丙丁,西接庚辛,北到壬癸,上极青云,下座黄泉。东仟伯,各有丈尺,东西南北,地皆属副。日月为证,星宿为明,即日葬送。板到之日,丘墓之神,地下禁忌,不得禁呵詈骂。坟墓宅兆,营域冢郭,闭系亡者魂魄,使道理开通,丘墓诸神,咸当奉板,开示亡人道地,安其尸形,沐浴冠带。亡者开通道理,使无忧患,利护生人。至三会吉日,当为丘丞诸神言功举迁,各加其秩禄,如天曹科比。若有禁呵,不承天法,志骂冢宅,不安亡人,依玄都鬼律治罪。各慎天宪,明承奉行。一如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诏书律令!<sup>[23]</sup>

此类买地券中,简谦、刘凯、何靖、姝女及元嘉二十一年和梁天监四年缺名买地券与徐副买地券内容基本相同,仅梁中大通五年周当界买地券内容较为简单。券文如下:

中大通五年太岁甲寅三月甲申朔十四日丁酉,老居(君)神符,敕道路将军、禁防地下二千石、蒿里父老、丘丞墓伯:今日大化复除,道民象郡新安县都乡治下里,没故女民周当界醉酒命终,今归蒿里,置宅在本郡县乡里来会罡上,符到部吏营卫皆令如法,敢有志骂,有犯者先诛后奏,尝安隧□者,使千年万岁不得于(干)犯生人,明承奉行,如太上老君律

令。

综合以上三类买地券的内容,可分解为以下几部分:

①时间、墓主人姓名、职官、郡望;

②墓主人买地情况(包括土地价格和四至范围,有的还有卖地人);

③冥府官吏或地下神仙作为见证人,并立券为证;

④以道教大神名义要求各路神仙、官吏保护墓主人对墓地及阴宅的合法占有,并保护墓主免遭其他亡灵侵扰;

⑤如有违反,依“玄都鬼律治罪”;

⑥墓主在地下不得干犯生人。

而三类买地券的内容和行文格式具有明显区别,甲类买地券主要包括了①、②、③三项内容,乙类包含①、②、③、④四项内容,丙类买地券绝大多数包含了①、②、③、④、⑤五项内容,部分买地券还有第⑥项内容。依券文内容分析:甲类买地券的主要内容是墓主买地的情况,基本上是依照现实中的地契形式;乙类买地券除明确墓主买地及对墓地和阴宅的合法拥有外,还强调地下诸神仙、官吏对墓主予以保护;而丙类买地券的内容主要是假托道教大神的名义,用道教律法要求地下诸神保护墓主的土地、阴宅及在冥府不受侵扰,买地的情况反而在券文中显得不太重要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乙、丙买地券,特别是丙类买地券,除了表明墓主人合法拥有土地和阴宅外,实际上还具有“护照”的性质,充当了墓主的“通关符”,或称“护身符”,保佑墓主在冥府生活安乐、万事顺利,在这方面,与东汉一些墓葬中随葬的镇墓文所起作用有些相似。

从行文的语气上,三类买地券也明显不同。甲类买地券完全是模仿现实地契记载了墓主在阴间买地的情况,乙类买地券除写明买地情况外,还对墓主对墓地和阴宅的合法拥有、地下诸神听命于墓主并给予亲切呵护、附近亡灵不得侵占等作了明确要求,丙类买地券则一开始就以太上老君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诸神保护墓主,并明确写明有功者举迁,有干犯墓主者依“玄都鬼律治罪”等奖惩措施,完全是为了保护墓主在阴间不受侵犯。

## 二 买地券中的道教因素

从22件买地券的内容来看,广西桂林出土的齐永明五年黄道丘、秦僧猛及另外两件永明年间缺名买地券、梁天监十八年覃华买地券等5件甲类买地券的道教色彩并不强烈,券文中仅提及“张坚固”、“李定度”两位地下神仙,券尾有“如律令”

用语。

而其他17件买地券则包含有明显的道教因素,反映了墓主对道教的信仰。

从徐副买地券内容可确认徐副的道士身份,并且生前担任“男官祭酒”职位,受“黄书契令”教阶,为道教的中坚骨干,在道教体系内属较高级别。欧阳景熙和周当界买地券中均有“道民”的明确称呼,因此,他们为道教信众无疑。

徐副、姪女、刘凯、何靖买地券之一(报告编号M413:8)、元嘉二十一年缺名买地券及梁天监四年缺名买地券券尾均有符咒,简谦买地券中有两件依发表的摹本观察也有符咒,它们与道教有密切关系,龚韬墓中出土的滑石符箓也应属道教之物,是道教信仰的反映。

券文中出现的诸多道教神仙、冥府官吏和道教用语等则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一是道教神仙和冥府官吏。太上老君、玄都鬼、女青、王侨、赤松子等均为道教所奉神仙。

太上老君即老子,被历代帝王和民间传统奉为道教始祖,也称道德天尊、混元都君、降生大帝、太清大帝等。南北朝以后太上老君被奉为道教的最高神之一,位列道教三清尊神中第三位<sup>[24]</sup>。太上老君是南朝买地券中出现的最高神。

女青是道教大神太上老君麾下的神仙。黄景春认为,女青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佛道冲突融合频繁时期,道教为“扩充其神仙世界和阴间世界”时,借鉴佛教的青鬼创造出来的。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女青既是道教大神的使者,又掌管玄都中宫鬼律,具有强大的镇伏万鬼的威力,券文和镇墓文中提及女青,正是要借助于她这种镇鬼威力<sup>[25]</sup>。

东皇父也称东木公、东华帝君。西王母又称金母、王母或西姥。两位本是神话人物,在道教神仙体系中,两位神仙共掌二气,分别掌管男仙和女仙的名籍<sup>[26]</sup>。

王侨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杜光庭《王氏神仙传》记载有三人,但有的文献记载至少有四人,包括越人王乔、周灵王太子晋、叶县令王乔和蜀人王乔<sup>[27]</sup>。

赤松子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一说为帝喾之师,后为道教所信奉<sup>[28]</sup>。

张坚固、李定度均为在买地券中充当保人或见证人的冥府小神。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侯、丘丞墓伯、地下二千、安都丞、武夷王等在6件乙类地券中一起出现,部分也见于丙类买地券。都是道教的地下官吏、神仙,属天师道教派,在《赤松子章历》等道教典籍中有明确记载。笔者曾在释读

龚韬买地券时进行较详细介绍,此不赘述<sup>[29]</sup>。

在丙类买地券中,除上述神仙官吏外,还出现了“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后土、土皇、土祖、土营、土府、土文、土武、土墓上、墓下、墓左、墓右、墓中央五墓主者,丘墓掾史,营土将军,土中督邮,道上游罗将军、道左将军、道右将军三道将军,都集伯长,营(茔)域亭(长),部墓门亭长,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一长串神祇名。他们都是太上老君敕令保护墓主及其阴宅的冥界鬼官,均见于《赤松子章历》等道教典籍。随斗十二神即十二时辰,本为古代天文算学中古式所用六壬式盘地支十二时辰将,据考证,此十二神将名最早出现在西汉末或稍早<sup>[30]</sup>。十二神将后为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中的神仙。《道法会元》卷一八六《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十二神职掌》云:“寅为功曹,卯为太冲,辰为天罡,巳为太一,午为胜先,未为小吉,申为传送,酉为从魁,戌为河魁,亥为登明,子为神后,丑为大吉。”<sup>[31]</sup>

上述诸多神仙官吏中,太上老君、东王公、西王母、女青、王侨、赤松子等在道教典籍中有广泛记载,而张坚固、李定度及天一、地二等诸神出现的范围则小得多,他们大多以功能相称谓,没有自己的专名,且多限于买地券、镇墓文中出现,其职责就是专门在墓葬中为死者服务。黄景春将他们称为“墓冢专职神仙”,并认为他们至少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早期道教神仙的草创性特征,多缺乏个性特点,没有经历过人格化加工;二是功能的直观性;三是活动地域十分狭小,多限于墓冢内;四是传承的稳定性,他们在我国宗教、民俗的传承过程中,一直具有一定的活力,从来没有死灭,直到今天<sup>[32]</sup>。

二是道教戒律和道教用语。在丙类买地券中出现最为频繁。

所有丙类买地券均在券首提及“新出(老鬼)太上老君符敕”,意即以太上老君的名义发出加带神符的敕令。券尾则多见“一如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诏书律令”。

《玄都鬼律》为道教戒律,在丙类买地券中有“依玄都鬼律治罪”,就是将《玄都鬼律》用于对地下阴间世界秩序的管理。

部分南朝买地券中提及墓主买地四至时均称“东极甲乙、南至丙丁、西接庚辛、北至壬癸、上极青云、下座黄泉”,王佛女和欧阳景熙买地券中称土地四至范围为“东至青龙、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同样属道教习语,两种表述的意思是一样的。青龙、朱雀、白虎、

玄武为分镇东、南、西、北四方之神,在道教中常为护卫神,以壮威仪<sup>[33]</sup>。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6件乙类买地券中均有一句“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玄都鬼传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得,随生人所居郡县乡里亭邑葬埋”券文。这6件买地券分别出于湖北鄂州(2件)、广东始兴(1件)和广州(1件)、广西桂林(2件)。依刘昭瑞的研究,“玄都鬼律”应指今存于《道藏》洞神部戒律类的《玄都律文》,并且包含了女青诏书。但遍查《玄都律文》,并无“从军乱以来……”之语。由此分析,墓主家族原非本地人氏,而是从外地迁入,在现地居住直至终老,在此埋葬。在买地券中假托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的名义,目的在于强调墓主在此买地埋葬、建置阴宅的合法性,以免受到其他亡灵的侵扰。关于“军乱”所指,刘昭瑞先生认为是指持续12年之久的孙恩、卢循起义,笔者认同此论<sup>[34]</sup>。孙恩、卢循起义的后段即卢循阶段,起义军的活动范围曾广及两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而6件乙类买地券正出于这些地方,据此推断,它们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三是道教节日。包括“三会吉日”、“五腊吉日”和“月晦十五日”等。

三会和五腊是道教的重要节日。据陆修静《道门科律》记载,三会日为农历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据称,此三日为“三官考核道民功过”的日子,也是早期正一道(即五斗米道和天师道时期)道民聚会的三个日子。在此三日,道民须赴本师治所,申报家口户籍,听道官宣讲科戒,接受三官考核功过,以定受录之等次。此制盛行于张鲁统治汉中时期,此后由于条件的变化,制度逐渐废弛<sup>[35]</sup>。

五腊吉日根据古代“腊日”祭先祖、百神之制而创。正月一日为天腊,是“五帝校定生人神气时限长短”之日;五月五日为地腊,是“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衰盛”之日;七月七日为道德腊,是“五帝校定生人骨体枯盛”之日;十月一日为民岁腊,是“五帝校定生人禄科官爵”之日;十二月八日为王侯腊,是“五帝校定生人处所,受禄分野”之日。五腊日兴起较早,至今亦为道教所奉行。特别是正月初一日的天腊之辰,仍为今日道教之重要节日,届时要按传统设醮祭天,祭先祖,以求福寿<sup>[36]</sup>。

月晦十五日指农历每月的十五和最后一天。道教节日中有三元斋(节),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sup>[37]</sup>。在我国民间许多地方,“中元节”又称“鬼节”,并与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有密切联系,主要



活动是祭祀死去的先人,超度各方冤鬼孤魂。在福建漳州等地,从七月初一至三十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sup>[38]</sup>。

### 三 买地券反映的南朝葬俗

从买地券券文内容可以对部分墓主人身份进行识别,22件买地券分属18位墓主人,其中简谦墓中随葬买地券3件(乙类2件、丙类1件),妳女墓中随葬乙、丙类各1件,何靖墓中随葬2件丙类买地券。18位墓主中,可辨女性6人,男性8人,其余不详。

18位墓主中,有3人生前担任朝廷职官,其中简谦生前任县令,龚韬任州从事史,刘凯任参军事,都是中、低级官吏。徐副的“界官祭酒”属道教职阶<sup>[39]</sup>。其余14人则未见担任职官的记载,秦僧猛、黄道丘、熊薇、何靖、熊悦等均为“民”。由此分析,随葬买地券的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多属社会中下阶层。有学者指出,六朝买地券主要在社会中下阶层流行,这和东晋、南朝大族、宗室兴起的标榜门第的砖石墓志有着本质区别<sup>[40]</sup>。此说可从。

这批买地券还是南朝社会土地私有关系的重要实证。南朝时期,形成于魏晋末年的门阀士族制度仍然存在,在经济方面则体现为田庄形式的生产模式,其主要的表现特征就是士族大量占有田地,以及部曲、佃客等劳动力。江南土著士族和北方南迁的士族都不择手段地掠取土地,扩张田庄经济,到后来又进一步占领山泽,发展园林和养鱼业。刘宋时期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的庄园“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sup>[41]</sup>。这表明,南朝时期的土地私有化严重,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不仅是土地,连佃客、部曲和奴隶等劳动力也成为世家大族的私有财产。这种现实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私有观念必然影响到埋葬习俗,而买地券的随葬正是这种观念的真实反映。南朝买地券虚拟了现实中的土地买卖关系和私有财产观念,随葬在墓葬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地下亡灵表明死者对墓地、阴宅的合法拥有。这在甲、乙两类买地券中反映尤其突出。如欧阳景熙买地券中写明“四域之内,尽属死人”,龚韬买地券中“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韬地”,徐副买地券中有“东西南北,地皆属副”等语,齐永明五年秦僧猛买地券中甚至写明“四域之内,生根之物,尽属死人”,这都是为了表明死者对墓地(还包括墓地范围内所有的物品)的合法占有。

南朝买地券还反映出强烈的“事死如生”的埋

葬观念。我国自古有灵魂不灭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墓葬中得到强烈体现,两汉时期的墓葬中随葬大量屋、灶、井、俑等模型明器,就是反映了对待死者如生者的观念。东汉末年以后,由于盗墓之风猖獗,开始盛行“薄葬”,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模型明器也日益简化。与此同时,自东汉出现的买地券作为一种以文字记载的随葬明器,则虚构了一个地下冥府世界,并且模仿现实社会建立了各种管理秩序。包括:

- 1、土地买卖关系,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 2、阴间百姓、冥府官吏等人群和各路神仙。
- 3、借道教大神和使者的名义建立了冥府管理秩序。

三类南朝买地券中,乙、丙类虚构的地下世界更完整,而丙类买地券中的官吏、神仙和秩序体系更为完备,如徐副买地券中不仅有丘墓掾史、土中督邮、墓门亭长等仿人间官制虚构的各种职官,以及如土墓上、墓下、墓左、墓右、墓中央五主者等在墓冢四周的冥府官吏,而且假托道教大神太上老君的名义,用“玄都鬼律”、“女青诏书律令”等道教律法维护冥府秩序,从而建构了一个完善的有百姓、官吏、神仙等各阶层,承认和保护土地买卖和私有财产,以及有完善的律法制度体系的阴间世界。陈直先生曾经指出:“汉人在一区冢围之内,假设各官吏之名,与生人官衙相似。”<sup>[42]</sup>这种以文字建构地下世界的买地券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事死如生”的生死观念和埋葬习俗。

### 四 结语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材料,南朝买地券在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发现,在分布地域和数量上均较东吴、两晋买地券增加。

依券文的内容,南朝买地券可分为甲、乙、丙三类,它们在券文内容、书写格式和行文语气上都有较大的差别。

从买地券的内容来看,南朝买地券至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包含了强烈的道教因素,反映了墓主人的宗教信仰观念。已发现的南朝买地券有一部分墓主就是道教信徒,其余虽不能确认为道教信徒,但其券文也与道教有密切联系,反映了道教在南朝底层社会的广泛影响。二是券文反映了南朝的生死观念和埋葬习俗,受现实社会中的私有观念和官僚等级制度的影响,人们以买地券虚构了一个有官吏、百姓、各路神仙,以道教律法维护秩序的阴间世界。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广西博物馆蒋廷瑜先生惠赐广西的买地券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附表// 南朝买地券统计表

时 间	墓 主	质地和尺寸	可辨字数	书写方式	出土地点	资料来源	备 注
元嘉九年(432 年)	王佛女	不详	112		江苏徐州	注[2]	
元嘉十年(433 年)	徐副	青石。33×26×2 厘米。	493	刻写。券文稍带隶意。	湖南长沙	注[15]	完 整。 券 尾 有 符 篆。
元嘉十六年(439 年)	简谦	砖质。31.3×15.5×4.5 厘米。	384	铭刻。	湖北鄂州	注[11]	
元嘉十六年(439 年)	简谦	砖质。31.3×15.5×4.5 厘米。	116	铭刻。	湖北鄂州	注[11]	
元嘉十六年(439 年)	简谦	砖质。31.3×15.5×4.5 厘米。	177	铭刻。	湖北鄂州	注[11]	
元嘉十九年(442 年)	瘠女	滑石。残长 11.5×3×2.2 厘米。	39	有竖行格线,格内竖刻券文。	广东始兴	注[12]	券 尾 有 符 篆。
元嘉十九年(442 年)	瘠女	滑石。残长 24×10.7 厘米。	214	有竖行格线,格内竖刻券文。	广东始兴	注[12]	券 尾 有 符 篆。
元嘉二十一年(444 年)	不详	砖质。30×16×6.5 厘米。	483	竖行刻写。	广东仁化	注[16]	券 尾 有 符 咒。
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	龚韬	滑石。18.5×17.9×0.9 厘米。	214	表面划出小方格后刻写文字。	广东广州	注[4]	出于墓 道,置砖 函内。
宋泰始六年(470 年)	欧阳景熙	滑石。18.2×11.6×0.5 厘米。	102	竖刻券文。楷书。	广西桂林	注[6]	
齐永明三年(485 年)	刘覬	陶质。50×23×8 厘米。	340	铭刻。楷书。	湖北武汉	注[17]	券 身 与 盖 分 置。
齐永明四年(486 年)	不详	滑石。长 12.1、宽 9.5 厘米。	93	竖刻券文。	广西桂林	注[6]	
齐永明年间	不详	大理石。残长 6、宽 10.2、厚 0.7 厘米。	35	竖刻券文。楷书。	广西桂林	注[6]	
齐永明五年(487 年)	秦僧猛	滑石。17.5×11×0.5 厘米。	110	四周和直行有分线界格。竖刻,楷书。	广西桂林	注[8]	
齐永明五年(487 年)	黄道丘	滑石。17.6×12×0.5 厘米。	113	竖刻。楷书。	注[6]		。
梁天监四年(505 年)	不详	砖质。34.6×17×6.8 厘米。	238	砖表面涂石灰层,上用朱砂行书券文。	湖南资兴	注[18]	券 尾 有 符 咒。
梁天监五年(506 年)	熊薇	页岩。28×16×1.1~1.2 厘米。	217	四周和直行有分线界格。竖刻。楷书。	广西桂林	注[6]	
梁天监十八年(519 年)	覃华	滑石。18.7×12.7×2.2 厘米。	98		广西融安	注[10]	
梁普通元年(520 年)	何靖	砖质。残 32.5×17.2×6.7 厘米。	256	砖面涂石灰,上用朱砂划直条格朱丝栏,再以朱砂行书。	湖南资兴	注[19]	侧 面 有 几 何 斜 方 格 纹。
梁普通元年(520 年)	何靖	砖质。36.5×17.5×7.2 厘米。	253	砖面涂石灰,上用朱砂划直条格朱丝栏,再以朱砂行书。	湖南资兴	注[19]	券 尾 有 符 咒。
梁普通四年(523 年)	熊悦	滑石。15.7×6.1×1 厘米。	195	两面竖刻。楷书。	广西桂林	注[6]	
梁中大通五年(533 年)	周当界	滑石	135		广西鹿寨	注[3]	

社 2004 年),刘屹著《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 2005 年)中对买地券也有专门论述。

[1]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2]近年来学界对汉、六朝买地券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涉及分类、历史地理、书法、道教因素等多方面。在此仅列举部分综合性研究论文,包括:王志高、董庐:《六朝买地券综述》,《东南文化》1996 年第 2 期;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南都学坛》2003 年第 23 卷第 2 期;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文史》2006 年第二辑。此外,罗宗真、王志高著《六朝文物》(南京出版

[3]1991 年,江苏南京西善桥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一方刻石,发掘者定为墓志(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东南文化》1997 年第 1 期),有学者对其内容进行了考释(朱国平、王奇志:《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东南文化》1996 年第 2 期),但另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该刻石非“墓志”,实为“买地券”(章湾、力子:《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兼述六朝买地券》,《东南文化》1997 年第 1 期)。据发掘简报和《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一

- 文,该刻石受侵蚀,表面漫患较为严重,泐损较多,铭文不全。从已经辨识的文字来看,该刻石的内容和行文均与其它买地券有较多不同,其性质有待进一步分析,故本文暂未将其作为买地券讨论。
- [4]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3》,台北文华出版公司,民国58年(1969年),第969页。
- [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刊于《文物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 [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淘金东路中星小学南朝墓发掘报告》,刊于《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年。
- [7]王志高、董庐:《六朝买地券综述》,《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
- [8][9][10][12][16][17]莫志东:《浅析桂林出土的南朝买地券及相关问题》,《桂林文化》2003年第3期。
- [11]黄增庆、周安民:《桂林发现南齐墓》,《考古》1964年第6期。
- [13]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第9期。
- [14]黄义军等:《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文物》2005年第10期。
- [15]廖晋雄:《广东始兴发现南朝买地券》,《考古》1989年第6期。
- [18]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出土南朝徐副买地券》,《湖南考古辑刊》1982年第1辑。
- [19]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香港1985年出版,第25~26页。
- [20]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第4期。
- [21][2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 [23]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文史》2006年第二辑。
- [2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三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 [25]黄景春:《早期道教神仙女青考》,《中国道教》2003年第2期。
- [26][2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宗教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6~7、9页。
- [27]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三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7~69页。
- [29][34]易西兵:《广州出土南朝龚韬买地券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 [30]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 [31]白彬:《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0~71页。
- [32]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 [3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 [35][36]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四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07、108页。
- [37]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 [38]郑传寅、张健主编:《中国民俗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惠西成、石子编:《中国民俗大观》(下),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第110~113页。
- [39]王育成:《徐副地券中天师道史料考释》,《考古》1993年第6期。鲁西奇认为“祭酒”并非天师道之独有称号,徐副的“祭酒”实为临湘县北乡白石里之祭酒(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文史》2006年第二辑)。
- [40]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 [41]梁·沈约撰:《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3页。
- [42]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Southern Dynasties Land Deeds

YI Xi-bing

(Gua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55)

Abstract: There are 22 land deeds of Southern Dynasties found in south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ext, these land dee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which have distinctions in terms of content, writing format and manner. Overall, these land deeds contain intense elements of Taoism, reflect the wide implications of Taoism to the underlying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xt contents of these land deeds also reflect the life and death idea and bury custom in the society of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land deed; Taoism; bury custom